

多地被曝公款吃喝“打白条”

专家建议推行“晒”预算

本报综合消息 5月25日有媒体报道，江苏盐城射阳港船闸管理所在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给酒店“打白条”负债27万。江苏射阳港船闸管理所隶属于盐城市交通运输管理处航道处，在编人数23人，实际在岗人员才17人。十几个人是怎么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吃出27万元？当天，记者就此事做了调查采访。

记者看到两张收条一共275350元，都盖着“射阳港船闸管理所”公章。第一张写于去年12月30日，是去年一年的账单，涉及75次招待，共250660元。另一张涉及10张账单，一共24690元，日期是今年初到2月6日的10次公款吃喝。

27万元并非是射阳港船闸管理所的全部欠款。它的上级单位——盐城市航道管理处在调查后发现，管理所的实际对外欠款达到50多万元。目前，盐城市航道管理处已经责令相关负责人停职检查，将所欠费用归还，并且将有关情况上报到纪检部门。

无独有偶，政府部门吃饭欠下巨额招待费的事情也发生在了河南。

近段时间一条消息在网上热传，河南邓州古城办事处10年间欠一家餐馆87万元招待费，餐馆因流动资金周转不开最后关门歇业。就此问题，记者采访了邓州古城办事处党委

的路培彦书记，路书记称确有其事，十年间街道办事处换过3任书记、4任主任，前任究竟是怎样欠下这么多招待费不便多说，但是已经和饭店老板达成了还款协议，3年内分期还清。

路培彦：好多年了，积淀下来的。最近呀，达成了协议了，比较满意，具体的情况是长期积淀下来的。

王先生以前在邓州市穰东镇政府上班，他告诉记者，以前上级部门来镇里检查指导工作，一般都在外边的饭店就餐，开饭店的也热衷于接待，但赚来的利润一般都是应收账款，因为往往不是付现金，而是打白条：

王先生：上边来人大部分是在外边餐馆吃，那时候基本都是欠账。开饭店的都是和政府领导有点关系，想着钱好要，但是有些就没有要来钱，只好关门。

曾是一家大型酒店管理人员的刘女士（化名）也向媒体证实，赊账、签单，已经成为公款消费的“行业惯例”。

刘女士：一般来说，开发餐厅的都是靠公款消费。越大的餐厅、越豪华的餐厅公款的消费比例越大，可以到八、九十的公款消费。只要是公款消费，没有一家是现场买单的。只要是公款消费，有一个结账的程序，要不然就是在乡镇下一级的打白条，在我们就是城市里面

的，所谓的就是签单，协议单位。

刘女士介绍，在公款消费的背景下，铺张浪费的程度更加触目惊心。

刘女士：我办过的餐饮十多万多一桌。鳄鱼肉、孔雀肉、天上飞的，地下走的，最好的。在我们当地，三五千是很正常的，稍微好一点基本上上万。

公务接待费一直成为基层单位日常开支的大项。频繁密集的接待活动也让基层单位苦不堪言。一位地方业务局的办公室主任对此表示：

办公室主任：单位接待，我个人最大的感受就是，单位上可能也不堪重负，领导也犯愁每一次接待经费从哪里解决，工作人员常常是为了这份接待，赔上自己休息的时间、陪家人的时间，所以不堪重负吧。

餐馆酒店为“白条”所累，基层干部又为接待所困。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王丛虎分析后认为，造成目前困局的原因来源于多方面。

王丛虎：第一个，再好的制度，总有一些本身制度上的漏洞，这是从制度层面。更重要的制度是要去执行，在执行层面，我们说往往会出现这样那样的行为，这是从制度执行。还有最核心的原因，我们说法律都明确的规定，比如杀人偿命这所有人都知道，但是还有人去

杀人。那就是说在每一个行为者本人，他的素质、他对自己的控制、约束的能力等等不同，这是一个综合的原因。

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看来，公款吃喝现象的背后有更深层的体制原因。

党国英：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理顺，分工如果不合理，上级政府管的事太多，下级政府有求于上级政府，有求于上级官员就试图通过招待来为自己解决一些问题创造条件，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在社会经济管理当中，我们一些官员的个人的自由财政权太大，它能不能满足基层政府的要求，可能不是更多的去看制度，看有关的严格的规定，而是自己自由裁量的空间大，自己说了算也造成基层为了解决问题，不得不招待上级官员的情况，所以我觉得体制上的原因我们更加重视。

怎样才能根治“公款吃喝”这个顽疾？王丛虎建议，除了建立公务灶节省开支，唯有推动财务公开，推行更加透明细化的预算制度。如果每一次吃喝的费用、人名等信息都能“晒”到公众面前，如果每一笔财务预算及报销都能在阳光下公示，“白条”也就不会那么猖獗，公款吃喝也自然会销声匿迹。

（景明）

环保开治“两考”环境不听招呼严管重罚

影响学生休息的社区噪声也在监管范围

□晚报记者 徐松

本报讯 5月23日，为应对2013年中招、高考，市环保局向全市下达通报，要求各县市区政府、职能部门全力配合，严控考场周边噪声污染，确保广大考生及考务工作者有一个安静的学习、工作及考试环境。凡环保部门监测到噪声污染点，会当场下达整改通知，如有企业或噪声污染源不听招呼、违规排噪，市环保部门将联合工商、公安等部门严管重罚。

据悉，市环保局提前1个月成立了中招、高招噪声监管巡视督导组，督导组细分为9个巡视分队，负责各县市区噪声监管；同时制定了中招、高招期间的噪声污染控制

方案，切实解决影响广大考生及考务工作者和市民反映强烈影响群众切身利益的噪声扰民问题。今年，除了对学校周围的饭店、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发放《关于加强高考期间环境噪声污染监督管理的通知》外，还对考生家长反映强烈的“社区噪声”开出了预防针：即严格对考点及学校周边500米区域内的噪声源进行降噪控制，确保考场周边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对群众居住比较密集的地方设立噪声监测点，保障社区安静，确保学生回家能安静休息、备考。

市环保局提醒广大家长和考生，中招、高考期间如遇噪声污染，请拨打12369环保举报热线，执法人员24小时值班。

线索提供 常兰军

一卡在手 看病不愁

我市9.7万名企业离退休人员拿到社保卡

□晚报记者 张洪涛

本报讯 5月24日，记者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我市自4月22日试发行全国统一的32K新标准社会保障卡以来，截至目前，已为96586名企业离退休人员进行了指纹认证并发放了社保卡。

新型社保卡通过加载金融功能，可以持卡缴纳社会保险费，领取养老金、失业保险金等社会保险待遇以及各类就业扶持政策补贴，支付医疗费用个人自负部分等。此外，新型社会保障卡还将在异地就医联网结算、异地生存认证、社保关系转移等跨地区业务上提供支持。据悉，今年全市有14万余退休人员要通过指纹认证进行年审并领取社保卡。目前，我市企业离退休人员的年审

与社保卡的发放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据市人社局有关人员介绍，由于今年的企业退休人员的年审和社保卡的发放工作同步进行，为了配合社保卡的发放，市人社局企业养老保险中心采取了多项便民措施：开设专门的发放窗口，材料接收审核、指纹认证，社保卡确认发放“一条龙服务”；抽调多人做好后勤保障服务，对高龄及行动不便无法来认证的企业离退休人员，可通过家属到社保大厅进行登记，社保中心将安排人员上门进行指纹认证、送卡服务。

市人社局有关人员提醒，目前我市还有4万余名企业离退休人员没有进行指纹认证，希望他们携带本人第二代身份证原件和领取卡，尽快到指定地点进行指纹认证和社保卡领取。

“60后”“70后”“80后”： 漫漫科学路 悠悠中国梦

据新华社电 1985年，当不满23岁的邓兴旺带着借来的50美元踏上赴美留学路时，并未计划有一天回国工作。经过多年奋斗，邓兴旺早已成为美国生物学界的“科学明星”，今年4月更是当选了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不过，邓兴旺还是决定，回到中国接受新的挑战。他的母校北京大学宣布，2014年，邓兴旺将全职到北大任职。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科研环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到“高层次创造性人才计划”，中国政府不断出台的各种鼓励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发展的计划像“万有引力”一样吸引着像邓兴旺这样的人才回国。

无论是早期出国的“60后”、“70后”，还是如今物质条件更优越的“80后”，他们或许有着不一样的出国梦。但在同一个中国梦的召唤下，他们的科学追求、人生轨迹都不约而同地再次与中国的发展交汇。

“60后”：回国干点事

作为“60后”的邓兴旺可以说已在海外功成名就：1992年他出任耶鲁大学助理教授，仅过3年便拿到美国“总统青年教师奖”，又过了3年成为终身教授，今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不过，邓兴旺还是选择回国发展。

“不是突然有一天当了院士，就想回国了，我心里酝酿这个想法有好几年的时间了，”邓兴旺对新华社记者解释说。“想回去干点事，这个原因是最重要的。我是农村出身，我觉得中国农业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很落后。在国外学习工作这么长时间，与大企业也有所接触，觉得在农业技术和产业化应用方面还能做点贡献。”

同为“60后”的东京理科大学教授赵新为是国际公认的半导体纳米领域专家，在国内出台的人才政策鼓励下，也“逐渐把重点移向国内”。

赵新为已在2003年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2011年又入选国家“千人计划”。目前正在国内筹备新的实验研究中心。他说，要把接近应用的研究重点放在国内，通过与产业界合作，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产品。

“70后”：寻求归属感

相比邓兴旺和赵新为这样的“60后”，多数“70后”学者尽管还未达到他们的学术高度，却已成为海外高端科研人才里的中坚力量。相比前辈们，“70后”们可能对家庭和收入等现实问题有更多考虑，但难以割舍的归属感还是让他们与“60后”殊途同归。

1976年出生在苏州的唐淳就选择放弃美国绿卡，回国建立自己的实验室。他在32岁那年便成为美国密苏里大学终身制助理教授，有自己的实验室，买了房，拿了绿卡。但2009年后，他还是通过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全职应聘至中科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工作。

他对记者说：“我碰到了很多人，他们都是近5年回国的，不到5年就建立了很好的实验室，国家和单位很重视。这在国外是不可能的，在国外，一个实验室要做10年以上，才可能达到同样的规模。”

他还说：“在美国做得再好，总有人会说，他是个中国人。如果在中国做得很好，别人会说中国有个谁做得很好。你的归属感就不一样了。”

“80后”：要大显身手

近年来，中国的科研投入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递增。2011年中国在全球最有影响力也就是被引用次数居于前1%的论文数量已跃居世界第6位，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对“80后”这些科学界新星来说，丰富的科研资源、有力的国家政策扶持，为他们创造了大显身手的舞台。

最近受媒体关注的武汉大学新聘的28岁正教授邓鹤翔，就是很好的例子。据武汉大学介绍，邓鹤翔正是国家“青年千人计划”的一员。相对开放的环境，是年轻一辈科研人才所渴求的，而他们将成为推动未来中国科学发展核心力量。

正如邓兴旺所说，中国梦和强调个人成功的美国梦不同，中国梦是强调国家和整体的成功，“中国是我的出生地，我认同中国梦。”